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两种生产”理论研究

康雨馨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5日

摘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核心基础,“两种生产”理论包含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两大维度。物质资料生产通过劳动改造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自身生产涵盖人口繁衍、健康培育与素质提升等内容,持续为社会生产输送劳动力,塑造整体社会结构。物质生产为人口存续发展提供物质支撑,决定人口发展上限;人口生产则为物质生产供给劳动力,左右生产效能。二者发展失衡将诱发劳动力缺口、资源紧缺等各类社会经济问题。当下,研究两种生产的协调发展具备重要现实价值,能够助力产业优化、完善公共服务、科学制定人口政策,推动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同可持续发展,为化解当代社会治理难题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两种生产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of Marxist Development

Yuxin Ka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y 11, 2026; accepted: June 3, 2026; published: June 15, 2026

Abstract

As the core foundation of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the theory of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consists of two dimensions: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means of subsistence transforms natural resources and creates material wealth through labor, serving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oduction of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covers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health cultiva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continuously supplying labor force for social production and shaping the overall social structure. Material production provides material support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determines the ceiling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population production supplies labor force for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affects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two will trigger various socio-economic problems such as labor shortages and resource scarcity. At present,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bear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It can facilitate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improve public services, formulate population policies in a scientific manner,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socio-econom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solving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History of Marxist Development,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两种生产”理论的形成背景

“两种生产”理论萌芽于 19 世纪 40 年代，1845 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次提及[1]，1884 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2]中完成系统论述。该理论的产生、完善与发展历经约四十年，研究其形成脉络，既要立足唯物史观整体发展历程，还需聚焦 19 世纪中后期，结合时代与理论双重背景展开探析。

(一) 时代背景

第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其坚定了经济基础。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持续到 19 世纪 40 年代，工业革命爆发并获得了蓬勃发展，工业革命的成果得到普遍运用，同时英法德等国家在工业革命的推进中逐步完成机器代替工厂手工业，实现了生产技术变革。

第二，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变革也为其奠定了社会基础。机器大工业的全面普及与飞速扩张，彻底瓦解了落后的封建制度体系，资本主义制度顺势取而代之。以雇佣劳动制度为核心的新型生产模式不断成熟完善，逐步在欧洲各国落地扎根，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西欧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但伴随资本主义的快速扩张，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固有矛盾不断凸显、持续激化，社会深层冲突不断累积。

第三，工业革命推动社会阶级格局迎来剧烈分化与重组为其奠定了政治根基。传统阶级体系被打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愈发尖锐，底层工人遭受残酷剥削与压迫，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工人抗争与反抗行动。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亟需科学、系统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引。各类工人罢工与武装起义接连爆发，充分表明无产阶级已然摆脱依附地位，以独立政治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主体。

第四，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持续突破，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条件和理论资源。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问世，掀起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浪潮，拓宽了学界研究视野，为相关理论探究提供了重要的

科学依据。而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系统梳理并深入阐释了原始社会的演化脉络与发展规律，填补了史前社会研究的空白，为两种生产理论的构建筑牢坚实的理论根基。

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生俱来的弊端日益暴露，生产过剩、经济失衡、社会动荡、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基于这一现实背景，马克思与恩格斯聚焦资本主义内在弊病，展开长期且全面的调研分析与理论探究，也进一步推动了两种生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二) 理论背景

1) 古希腊哲学家对于“两种生产”的思考

第一，在物质资料生产层面，古希腊人普遍意识到生产劳作是城邦存续、人类生存的根本前提。城邦以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生产为根基，色诺芬率先聚焦现实生产实践，在著作中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将农业视作一切产业的基础，认为农耕是维系家庭运转、保障城邦物资供给的核心生产活动，同时系统探讨了庄园管理、劳作分工、物资获取等实际生产问题，清晰认知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稳定的支撑作用。柏拉图从理想城邦建构出发，提出社会分工理念，主张依据人的天赋划分不同职业，通过专业化的生产协作，保障衣食住行等基础生活资料的稳定产出，以此维系城邦秩序[3]。在《荷马史诗》中，古希腊哲学家借史诗内容赞美英雄的征战之举与杰出劳作，秉持体力劳动并无高低贵贱的观念，即便是英雄，也同样认可劳动的价值。赫西俄德则在《工作与时日》中严厉批判懒惰懈怠、游手好闲的行径，着重凸显劳动的核心意义，主张美好生活唯有依靠辛勤劳作方能缔造，充分彰显并肯定了劳动所具备的正向价值与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辨析自然生产与牟利性生产的区别，肯定农业、手工业等自然生产的正当性，认为适度的物质生产是满足公民基本需求、维系城邦良性运转的必要条件，深刻阐释了物质资料生产的内在价值与社会意义[4]。

第二，在人自身生产，也就是人口繁衍与族群延续层面，古希腊哲学家同样有着系统且务实的认知。城邦的发展实力、军事力量与治理规模，都和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密切相关。色诺芬明确提出婚姻的本质意义在于人类传宗接代，强调人口繁衍是族群延续的必然要求，主张通过鼓励婚配、增加人口数量，壮大城邦劳动力与军事储备[5]。苏格拉底提出了要“认识你自己”，促进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并进一步形成了劳动与人自我认知的关系[6]。他强调在创造物质财富和塑造健全人格中，劳动有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柏拉图结合理想国家的构建需求，倡导适度人口理念，主张管控城邦人口规模，推行优生思想，规范生育行为，避免人口过剩或短缺引发社会矛盾，以优质的人口结构稳固城邦根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进一步完善相关观点，批判无序生育带来的贫困、动荡等问题，主张以法律规范婚姻与生育，维持合理的人口体量，实现人口发展与土地资源、生产能力的相互适配，凸显了人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相协调的朴素观念。

总之，古希腊哲学家并未形成完整、体系化的两种生产理论，其思考大多依附于城邦治理、伦理探讨与现实治理需求，具有直观性与时代局限性。但他们已经自发意识到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繁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双重基础，初步洞察二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这些散落的思想观点，是西方早期生产观与人口观的重要雏形，既反映了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发展特质，也为后续古典思想发展，乃至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古老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借鉴。

2) 古典哲学对于“两种生产”的思考

第一，德国古典哲学的丰富成果为其夯实了理论基础。德国古典哲学滥觞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其积累的丰富思想成果，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桎梏，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料。其中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贡献最为突出。黑格尔建立了系统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摒弃了以往哲学将历史视为静止不变、偶然堆砌的片面观点，提出历史辩证法思想，将人类社会历史理解为内在矛盾驱动、不断自我否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持续演进的动态过程。与此同时，黑格尔在

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起源时，首次将家庭、人口繁衍、物质生活资料等现实要素纳入历史研究范畴，承认人口增殖与物质生活是社会存续的基本条件，为后世理解两种生产的历史性与矛盾运动性提供了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7]。费尔巴哈则打破了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思辨框架，构建了人本学唯物主义，重塑了哲学的研究基点。他将哲学研究从抽象的“绝对精神”回归现实的人，强调人是自然的、感性的存在物，人的生命存续、自然繁衍与生存需要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先决条件，蕴含着珍贵的唯物主义内核[8]。费尔巴哈立足人的自然存在阐释社会存在，肯定了人的自身生产对于社会存续的基础性价值，颠覆了精神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虽然其理论脱离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将人视作抽象、静止的自然人，存在明显的理论短板，但为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现实个体、研究人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核心的唯物主义理论依据。

第二，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缺陷难以从根源上解决社会矛盾。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哲学体系，它试图从哲学层面解释社会变革与时代危机，但受限于资产阶级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与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其理论始终停留于抽象的精神层面，脱离现实的社会实践与物质生产活动。这使得其既无法科学回应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后阶级对立、社会动荡、贫富分化等一系列时代难题，也不能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难以从根源上破解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类社会矛盾。

马克思与恩格斯批判性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克服其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立足现实物质生产实践，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自身生产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可见，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积淀，是“两种生产”理论得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前提。

3)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两种生产”的思考

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于“两种生产”理论产生了思考。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首次将物质生产与财富创造作为社会研究的核心，确立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威廉·配第率先打破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贸易流通的片面认知，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经典论断[9]，明确劳动生产是社会财富积累的根本来源，肯定了物质生产活动对社会存续与经济决定的决定性作用。亚当·斯密在此基础上完善生产理论，聚焦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提出分工能够有效提升劳动生产效率[10]，推动工商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财富持续增长。他指出，一切社会发展、人口存续、社会文明进步，都必须以持续的物质资料生产与财富积累为前提，深刻阐释了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此外，他还指出人口数量与劳动力规模直接决定社会生产能力，人口的自然繁衍能够持续补充劳动力资源，推动社会分工细化与生产规模扩大，反之，物资匮乏、经济衰退则会抑制人口增长，直观阐释了物质生产与人自身生产相互制约、双向互动的关系。而后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前人思想，聚焦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围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与社会再生产展开研究，进一步论证了物质资料持续再生产，是维系资本主义社会运转、保障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迭代的核心动力，完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物质生产理论[11]。弗朗索瓦·魁奈把财富划分为消费性财富与生产性财富两大类，其中维系人类生存、保障族群繁衍的物资属于消费性财富，而投入生产活动的物资则归为生产性财富[12]。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两类财富之间存在相互联结的纽带关系。尽管这类研究思考不够深入系统，认知相对浅显片面，但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过剩现象，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与思想借鉴。

4) 空想社会主义对于“两种生产”的思考

第一，傅里叶、圣西门等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异化本质与无序性。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极强的盲目性与逐利性，资本家为追逐私人利润肆意扩张生产，引发生产过剩、资源浪费、产业失衡等问题，导致物质生产无法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反而成为剥削工人、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工

具。傅立叶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弊端，认为资本主义分工模式僵化且畸形，压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割裂了人与生产劳动的本质联系，造成物质生产与人类发展相互对立[13]。与此同时，欧文立足工厂生产实践，直观见证了机器大生产下工人高强度劳作、却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现实，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物质生产成果被少数资本家垄断的不合理现状，并主张重构社会化生产模式，统筹社会生产资源，实现物质资料生产普惠共享，满足全体民众的生活需求。

第二，他们率先将人口生产、人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相结合，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生产的畸形状态，提出了适配理想社会的人口发展理念。圣西门提出，人口的繁衍与发展并非单纯的自然生理行为，而是与社会制度、生产水平深度绑定的社会行为，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培育全面发展的人，而非单纯积累财富[14]。傅立叶在其和谐社会构想中提出，在合理的社会组织模式下，物质生产的富足能够保障人口良性繁衍，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数量、质量与社会生产力的双向适配。欧文更是聚焦底层工人的生存与繁衍困境，认为工人贫困、子女流离、人口素质低下等问题，并非人口自身繁衍过剩导致，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剥削制度的产物，并通过社会实践，尝试通过改善生产条件、优化社会福利、普及教育，实现人自身生产的良性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但他们关于两种生产的思考存在显著的历史局限性。他们未能洞悉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的根本矛盾，脱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否认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试图依靠社会改良与道德感化实现两种生产的良性发展，其构想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无法落地实践。马克思与恩格斯充分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思想与合理构想，摒弃其唯心史观与改良主义缺陷，立足唯物史观与社会实践，进一步完善了两种生产辩证统一、协调发展的核心理论，丰富了“两种生产”理论的内涵与现实价值。

2. “两种生产”理论形成与发展脉络

1) 萌芽时期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标志马克思早期唯物史观思想萌芽的重要著作，也标志“两种生产”理论的萌芽。在此著作中，马克思打破了传统唯心主义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固有认知，开始深度探索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本质关联与内在逻辑。马克思针对性地批判了黑格尔颠倒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清晰阐释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核心思想，推翻了黑格尔所主张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理论，厘清了国家、家庭与市民社会的主次关系，意识到世俗的社会生活、现实的社会结构才是国家制度与国家意志的本源。从理论体系来看，该著作并未专门、系统地阐释“两种生产”理论，没有形成完整成熟的理论框架与定义。但马克思立足现实社会、聚焦市民社会与人类生存发展的研究视角，已经触及人类社会生产、人口繁衍等核心问题，让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雏形初步显现，为后续马克思、恩格斯完善并正式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奠定了早期的思想基础。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人口与生产相关的理论研究，为“两种生产”理论的成型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对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经典人口理论展开了深刻批判，摒弃了其将人口过剩归结为人类自然繁衍过剩的片面观点。恩格斯立足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展开分析，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人口过剩现象，并非单纯的自然人口增长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催生人口过剩问题的根本诱因，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底层逻辑与运行规律时，对社会生产的核心要素进行了界定与解读。他提出：“这样，我们这里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即劳动”[15]，“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15]。这一论述精准拆解了社会生产的基本构成，明确将人定义为核心的主观生产要素，强调人的劳动、肉体劳作与精神活动都是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同时肯定了自然资源作为客观生产要素的

基础性地位。这些对生产要素、人口与人的劳动价值的深度论述，进一步完善了早期生产与人口相关理论体系，为后续系统化的两种生产理论构建筑牢了重要的理论根基。

2) 初次系统阐述

《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两种生产”理论的诞生。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该书中首次对“两种生产”思想展开系统性阐释。他们将人类历史的基础性实践划分为四个维度，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基于新生需求产生的物质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命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生产，完整囊括并初步建构了“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创造历史的首要前提是维持自身生存，而衣食住行等基础生活物资的获取，离不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作为人类存续、开展一切社会实践与历史活动的先决条件，物质资料生产既保障了人类基础生存需求，也暗含了维持个体生命、延续人类存在的人自身生产逻辑。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阐释了物质再生产的历史意义。当人类基础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满足需求的生产实践、生产工具的迭代更新会催生全新的生活需要，驱动社会持续开展物质再生产，这一过程隶属于物质资料生产范畴，是推动社会物质生产持续迭代、历史不断演进的重要动力。除此之外，他还重点阐释了人类自身生产的本质内涵，即人类在维持自身生命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婚配繁衍完成他人生命的再生产，实现族群延续。这种生命生产活动不仅是人类自然繁衍的生理过程，更会催生相应的社会联结，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构建起人类存续所需的基础社会关系。但因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研究水平与科学认知条件，仅完成了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初步系统化建构，尚未结合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深入剖析两种生产的历史运动规律与社会驱动价值，理论体系仍存在不完善、不成熟之处，亟需后续进一步的补充、拓展与完善。

3) 形成时期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生产与消费、分配、交换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系统地阐释。马克思系统梳理了社会再生产运行逻辑，提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的论断，从生产与消费辩证统一的独特视角，进一步丰富与阐释了“两种生产”思想[16]。马克思指出，消费过程本质上同样属于生产过程，如同自然界植物通过消耗外界物质完成自身生长，人类也能够通过消费活动实现自我再生产。以饮食消费为例，人类通过基础消费维持机体运转、存续自身生命，而一切服务于人类生存、滋养人体机能的消费行为，本质上都是对人自身的生产塑造。这一理论阐释清晰揭示：消费活动是实现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关键途径，能够持续补充人的体力与脑力，保障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为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持续开展筑牢主体前提。除此之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持续聚焦人自身生产的内涵、价值与运行逻辑，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规律，对人类自身生产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多角度的延伸探究，持续完善“两种生产”理论的内在体系。

首先，马克思论证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与先决价值。马克思提出：“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已经存在的自然。一方面是活的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土地。”[17]由此看出，在全部社会生产活动中，人始终是具备能动性、创造性的核心主体，以土地等自然资源为客观依托的独立个体，是一切劳动生产得以落地的基础前提。其次，马克思全面阐释了人自身生产的丰富性与全面性。他指出“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17]。这一观点打破了将人的再生产简单等同于人口繁衍、肉体存续的片面认知，揭示了人的再生产的多元内核是人类的自我生产不仅包含基础的生命延续、族群繁衍，更涵盖了个人劳动能力、思维精神、综合素质、社会属性的全方位生成与发展，极大拓展了人自身生产的理论内涵，完善了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体系。

其二，在工资的决定因素的分析中包含着“两种生产”理论思想。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非仅围绕个体生存需求划定边界，其构成维度更为全面且多元，工资既需要涵盖保障劳动者自身

日常生存、基本生活消耗的物质资料费用，以及满足劳动者基础技能学习、素质提升的教育培养支出，同时还必须囊括维系整个家庭正常运转、保障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必要开支[18]。这就意味着，工资的本质底线是维系人类基本生命存续，其价值构成兼具双重属性，既要支撑劳动者个体的生存与再生产，也要承担起供养家庭、维系人口繁衍与家庭延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工资决定条件与构成内容的阐释，将个体生存生产和人类自身繁衍的家庭生产紧密结合，完整且充分地折射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逻辑与思想要义。

其三，马克思在系统阐释资本主义社会人口规律的过程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两种生产”理论思想。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资本积累持续推进，资本有机构成会呈现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总资本当中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占比不断相对缩减，社会对雇佣劳动者的需求随之逐步下降。大量劳动者被迫脱离生产岗位，进而形成规模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最终沦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产业后备军。在围绕资本主义特殊人口规律展开深入研究与现实剖析的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开展广泛的社会实践考察，立足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自身生产的互动关系，进一步补充、完善并发展了两种生产理论，推动该理论在现实批判与现实研究中不断走向成熟。

4) 完整系统阐述

晚年阶段，马克思将重点研究人类学相关著作，不断丰富和完善该理论，推动其走向成熟。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立场，批判性地审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精准指出并纠正其唯物主义立场的不彻底性与理论局限。同时，马克思系统摘录梳理了摩尔根关于五种社会形态演变的相关论述，结合原始社会的历史发展实际，深刻阐释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自身生产这两种生产方式在原始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核心作用与内在关联。马克思进一步阐明，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缓慢提升，氏族血缘组织的影响力持续深化，人类在生活资料获取、物资生产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不断取得进步，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人类历史逐步迈入野蛮时代的低级发展阶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地提出“两种生产”理论[19]。在书中，他完整地阐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因素。但是，生产有两种，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即事物、衣服、住房以及由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繁殖。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都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即受着劳动发展的阶段的制约和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在此书中，他还对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两种生产的表现和作用进行了考察。在1890年答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依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0]。由此可见，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观点和看法，即强调经济因素，但又不能将经济因素单一化和绝对化。

5) 当代发展与历史局限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前提，奠定了从生产结构维度解析家庭、人口与社会变迁的唯物史观范式。首先，两种生产所确立的物质生产与人口繁衍相互制约、辩证统一的底层逻辑，仍能够有效解释当代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代际更替等现实社会问题。女性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聚焦生育行为、家务劳动、情感照料与劳动力代际再生产，将其非市场化家庭劳动纳入社会生产体系的研究取向，与经典两种生产理论重视人类自身生产的理论立场高度契合；新马克思主义则将家庭视作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载体，揭示家庭无偿劳动为资本积累提供隐性支撑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延续并印证了两种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使其依然具备阐释现代家

庭、婚育与社会结构关系的理论张力。同时，经典两种生产理论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其一，理论侧重从宏观历史维度阐释人口繁衍与家庭存续，缺乏性别分析视角，未能深入揭示家务劳动、生育抚育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分工，对女性承载隐性再生产劳动的结构性困境关注不足。其二，传统理论对人类自身生产的界定较为狭义，仅局限于人口繁衍与生命延续，尚未涵盖教育、医疗、养老、精神情感照料等现代广义社会再生产内容，理论边界相对狭窄。其三，理论以传统异性核心家庭为默认范式，难以适配当代单身家庭、丁克家庭、单亲家庭等多元家庭形态的再生产实践，也未能充分剖析市场经济扩张下家庭功能弱化、生育成本私人化等现代矛盾。

在当代理论视域下，两种生产理论可在与相关理论的对话中实现拓展与深化。一方面，吸纳女性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成果，将无偿家务劳动、生育照料劳动正式纳入生产范畴，把狭义人口自身生产拓展为广义社会再生产，补齐性别平等的理论维度。另一方面，借鉴新马克思主义对家庭与资本关系的批判视角，厘清资本积累转嫁再生产成本的内在机制，推动生育支持、托育养老、家庭保障等公共政策建构。在此基础上，突破传统家庭单一再生产模式，构建家庭 - 社会 - 国家协同再生产的分析框架，对接人口结构变迁、家庭形态多元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诉求，推动两种生产理论由经典历史阐释转向回应当代社会现实的创新性发展。

3. “两种生产”理论的价值启示

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革，人口结构迎来阶段性转折，人口总量步入负增长阶段，少子化与老龄化交织叠加并逐步常态化，人口领域涌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新矛盾与新挑战。“两种生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科学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相互作用的客观历史规律。立足当下现实，依托这一经典理论审视与剖析我国人口发展难题，对于精准把握人口演变趋势、破解现实人口困境而言，具备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首先，为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理念明晰了底层逻辑。社会发展本质上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物质生产决定人口生产的水平与质量，而人口生产反过来制约和影响物质生产的发展速度与发展潜力，二者缺一不可。长期以来，社会发展更侧重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提质增效，忽视了人口再生产的基础性作用。而新时代背景下，人口数量增速放缓、劳动力规模下降等问题，凸显了人口生产滞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依托两种生产理论，有助于摒弃单一的经济增长思维，树立人口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全局理念，正视人口再生产的社会价值，实现物质财富生产、人口繁衍发展双向平衡。

其次，为解决人口结构性转型的现实困境，破解少子老龄化、优化人口结构提供实践依据。当前少子化、老龄化深度叠加，适龄生育意愿偏低、养老压力持续增大、劳动力结构老化等一系列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两种生产发展失衡的集中体现。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成本的提升，改变了家庭人口生产的条件与意愿，导致人口再生产动力不足。因此，解决新时代人口难题，可以立足经济、社会、家庭多维视角，通过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养老保障体系、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赋能人口再生产，让人口结构、人口质量适配新时代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最后，为统筹人口发展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提供助力。在传统发展阶段，充足的劳动力人口是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而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单纯的人口数量优势已无法适配现代化发展需求。人口生产不仅包含人口数量的繁衍，更涵盖人口素质、人口质量的提升。新时代下，可以聚焦人口高质量发展，通过完善教育体系、强化人才培养、提升全民综合素质，优化人口质量与结构，重塑人口发展优势，实现人口生产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推动人口发展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社会进步深度融合，助力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2]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3]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4]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 [5] 色诺芬. 经济论[M]. 张伯健, 陆大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6] 柏拉图. 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M]. 严群,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7]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8] 费尔巴哈. 未来哲学原理[M]. 洪谦,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 [9] 威廉·配第. 赋税论 献给英明人士 货币略论[M]. 陈冬野, 马清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 [10]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 [11]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 [12] 弗朗索瓦·魁奈.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 吴斐丹, 张草纫,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3] 夏尔·傅立叶. 傅立叶选集(第二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4]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 圣西门选集(第二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2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